

苗侗文坛

1999 2



MIAODONG WENTAN



苗侗文坛 1999 年第 2 期总第 41 期

主 办 黔东南州文艺研究所

编 辑 苗侗文坛编辑部

地 址 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南路

邮 编 556000

电 话 [0855]8222632

主 编 杨 繁

副主编 吴佳新

印 刷 贵州省黄平县民族彩印厂

黔新出(98)内资准字1087号

苗侗文坛

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总第四十一期

生态价值观 毛 艳(40)

——对少数民族“绿色文化”传统的反思

关于西江鼓藏节的文化思考 祖 民(48)

温和文化民族之启示 游建西(21)

论印支国家苗族的游耕农业文化

..... 杨 鸬(29)

论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

生态价值观 毛 艳(40)

——对少数民族“绿色文化”传统的反思

关于西江鼓藏节的文化思考 祖 民(48)

人物形象与民族命运 邓敏文(54)

——读改革时代的侗族小说

苗族祖先民族民俗学考察 王大有(62)

张喜荣

从出土文物看五溪先民的原始

宗教观念 舒向今(79)

论苗族花山节的起源及社会

文化功能 罗兴贵 (91)

试论云南民族传统服饰的嬗变

..... 潘定红 (99)

丽江纳西族居住民俗初探 李 妹 (107)

侗族民歌与民俗的关系 石家国 (114)

黔东南苗族习俗概述 喻帮林 (120)

湘西苗族的姓氏 吴善淙 (132)

侗家爱树爱得奇 龙燕怡 (134)

龙民怡

侗乡竹趣 龙燕怡 (136)

新时期的贵州民间文艺 潘定智 (140)

半个世纪以来三套“西南民族

文化研究”丛书评介 黄 泽 (150)

封面设计 石俊生

东夷苗蛮的由来

□ 石宗仁

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林惠祥在其著《中国民族史》中说：“东夷种属未明。”^①迄今，虽有“苗蛮东夷一族两名”、“苗蛮源于东夷”、“东夷为夷为夏”之见，但均未说清东夷的族属。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研究者没有对东夷与苗蛮的关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审视，尤其没有对其进行民族学的总体把握与认知，仅从非民族学的某一学科的有关材料，来说明东夷的族属是很难说清楚的。曾有人从考古学论述“苗蛮源于东夷”^②，不直说苗蛮是东夷，但还是半明半暗地说了东夷与苗蛮为同一族系，只不过把东夷源于苗蛮先民蛮夷，说成是苗蛮源于东夷，没能像先贤梁启超先生所说“苗蛮东夷，为一族两名”那样明朗而确切。固然东夷汉化较早，给后人研究、认定其族属带来相当的难度，但只要我们排除早已过时的中国古代文明唯黄河中心论以及后来的唯河姆渡中心的影响，并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民族学材料与新考古成果中，仍可以找到许多

能证明东夷与苗蛮的关系及其族属的材料。尤其要指出的是，仅仅用旧的考古材料论证东夷的族属及其与苗蛮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构成民族要素的族称、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信仰与习俗等方面的材料，绝大部分都不在地下。而有关民族形成，除斯大林关于构成民族的四个要素之外，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杨堃、熊锡元等人，根据我国各民族的情况还认为：除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四要素（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与共同心理素质）外，“各民族都有共同名称，没有共同名称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③、“处于农业文明社会的民族来说，把风俗习惯列为一个构成要素，作为一个共同特征就显得十分必要了。”^④因此，在我们探索古代民族的族源时，亦离不开该民族的族称（自称、他称）、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信仰文化与习俗等方面，对其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思考与论证。

虽然东夷的种属未明，但苗蛮的种属与族源历史是清楚的。由于东夷与苗蛮历史上有着不可否认的亲缘关系和相连一片的地域，因此，笔者认为，必须从构成民族的族称、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信仰文化与习俗，来了解东夷与苗蛮的关系，进而探明东夷的族属。关于苗蛮，我国著名的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认为：“苗蛮集团……古时有时叫它作蛮，有时叫它作苗，我们感觉不到这两个名词中间有什么分别，所以综括两个名词，叫它作苗蛮。”“苗蛮二声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⑤可见，蛮即苗，苗即蛮。笔者还认为，苗蛮集团应包括现今苗、瑶、畲三民族的先民，因为瑶、畲民族先民，古时为苗蛮族的一部分，后来才分成三个民族的。但苗蛮集团，则不包括藏缅语族与壮侗语族各族，前者

属于西羌族群，后者属于百越群体；其历史区位，一在苗蛮集团区域之西，一在苗蛮集团区域之南至海边。又因苗蛮集团在黄河中原华夏集团区域之南，故又史称苗蛮为南蛮（狭义的），此南蛮（苗蛮）聚居在荆楚之地，荆楚又自称蛮夷，可知此南蛮为苗蛮（即三苗），其先民自称为蛮夷，亦即那个为盘瓠辛女所生的六男六女，自相婚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的蛮夷，即为苗族无疑。与后来广义的西南蛮夷之西羌族群、百越群体无涉。了解如上所述，有利于我们探索东夷与苗蛮的关系及其族属。于下先谈夷与东夷、苗蛮的由来：

一、“夷”字结构组合的涵义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苗族，善作弩弓。如蚩尤作的五兵中，有一种古兵器称作大弩，即弩弓，是一种机械发射的弓箭。而“夷”字的结构组合，据苗族解释性传说认为，它是“一”、“弓”和“人”三部分合成。“一”显然是代表“天”，“弓”和“人”即为造弓的人或部落，固“夷”字结构的组合含义，即为射天部落的人们，或为射日月部落的子民。射天，即为射日月。苗族民间普遍流传射日月的英雄史诗与传说。如贵州苗族的杨亚射日月和湘西苗族的仡苏仡干射日月。12个太阳12个月亮（也传说为10个太阳10个月亮）各被射落了11颗（或9颗），才有人们如今在1个太阳1个月亮的世界里生产生活，繁衍后代。此种射天（射日月）传说，在湘黔滇渝鄂桂琼等省市区的苗族民间，均有广泛流传。南方学者侯哲安先生，对南方少数民族射日月的神话传说，作了广泛的收集与研究比较，认为射日月的传说在南方各民族中，“以苗族最为普遍。”^⑩而神话传说，都是历史的曲折反映。

正如天石先生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序中指出：“神话是基于社会生活的艺术的夸张与渲染，并夹杂着空想与幻想，但或多或少地反映历史的影像。”由上所述可知，“夷”与苗族射日月部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于善射的先民，张雄教授在《中国中南民族史》一书“溪子国”中博引广证并指出：“《淮南子·俶真训》云：‘乌号之弓，溪子之弩，不能无弦而射。’高诱注：‘乌号，柘桑也，溪子，为弩所出国名。或曰溪，蛮夷也，以柘桑为弩，因曰溪子之弩也’。又注‘登千仞之溪’云：‘溪，野夷也，以柘桑为弩，一曰溪子国’。”“《史记·苏秦传》云：溪子‘射六百步之外’。《集解》许慎云：‘南方溪子蛮夷柘弩，皆善射’。《索隐》按：许慎注《淮南子》以为南方溪子蛮出柘弩及竹弩。”“《汉书·司马相如传》云：‘建于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应劭曰：‘楚有柘桑，乌栖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飞，欲堕号呼，故曰乌号’，‘溪子蛮夷’当居住荆楚之地。”“楚人亦以善弓弩之技而著称。《战国策·西周》云：‘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陈寅恪先生在释证《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时指出：‘溪，实即指《后汉书·南蛮传》盘瓠种蛮而言也。’‘此支蛮种所以号溪者，与五溪地名至有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溪子蛮夷’当系荆楚土著民族——‘盘瓠种蛮’之别称。”^⑦可见制弩善射之夷人为溪子蛮夷，即崇拜盘瓠的五溪蛮夷或荆楚蛮夷，当是苗瑶畚先民与苗族的指称。

二、夷的缘起及其指代

夷，为蛮夷的省称，此蛮夷即为《风俗通义》所载的盘

瓠子民，其后滋蔓，号曰蛮夷的蛮夷，历史文献称其为盘瓠种落、盘瓠蛮、蛮夷、夷、三苗、荆蛮、蛮、苗等。关于夷的指代，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在其遗著《炎黄氏族文化考》中指出：“神农之后有蚩尤，蚩尤之后为三苗，推之江汉诸蛮，皆神农后。”然黄帝族“自居为夏，目炎裔为夷。夷即所谓‘非我族类者也’。”可知夷不是夏。夏属黄族，九黎三苗属炎族。如“三苗九黎之后。《楚语》韦昭注：‘三苗炎帝之后。’”^⑧“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注：‘三苗九黎之后……黎属炎族，苗为其后，知苗亦炎族。’”^⑨由上可知苗蛮、东夷同属炎族。关于炎族，是因为“神农脩火之利，故为炎帝”^⑩。而“邾娄为炎帝族名……”^⑪此炎帝族实为炎蚩族，而炎蚩族，即为曾北进黄河中原发展农业生产的三苗的先民蛮夷。蛮夷族的炎蚩部属，又名邾娄。黄帝族入主中原后，在中土发展农业的苗族（三苗）先民蛮夷族的炎蚩部众，被称为炎族、邾娄，黄帝驱其去东的曰东夷，驱其去南的曰苗蛮。故王献唐先生说：“唐虞以下，呼其在东方曰夷……南方曰蛮”^⑫。实乃同属蛮夷的分名。关于邾娄：邾娄为炎帝族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注：‘侏离，蛮夷语声也’。”^⑬“所谓语言侏离，侏离亦即邾娄，蛮人反舌之音是也。”^⑭“邾娄之名，起于语言……所谓语言侏离，侏离亦邾娄，蛮人反舌之音是也……邾娄之起，殆于此。然此邾娄之族，本不居邹，乃由黄帝迁徙而来。其未迁以前，所居之地原为浊鹿，浊鹿即邾娄，音义相同。初居浊鹿，迁邹之后，仍名浊鹿，浊鹿又书名同音之邾娄，遂成邾娄。”“何以知邾娄原居之地为浊鹿也？曰：浊鹿为蚩尤所居（见《路史》，黄帝戮而迁其名于邾娄（即邹屠），知邾娄之民来至此。浊鹿，周书作独鹿，亦作涿鹿，同

音通用。”^⑧独鹿、浊鹿、邾娄、涿鹿，均为蛮夷语言，既然“浊鹿，周书作独鹿，亦作涿鹿，同音通用”，并为蛮夷语之同音异译汉字地名，我们不妨采用蛮夷语言（即苗语）文化，来解释“独鹿”（与其同音的浊鹿、涿鹿）这一地名的文化含义。湘西苗语称常耕种的熟地（旱地）为“鲁”，称“宽广平坦的常耕熟地为“同鲁”或“吉鲁”，显然，“同鲁”与“独鹿”（浊鹿、涿鹿）、“吉鲁”与“晋鲁”、“冀鲁”同音义，因为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四省之间的地区，正是黄河中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是我国旱地农业最早开发与发达地区，那儿有宽广平坦的常耕地，这与独鹿（同鲁）、吉鲁——晋鲁——冀鲁——豫鲁大地地貌相符。这绝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历史存在的客观原因。因为华夏先民黄帝族从黄河上游进入中原之前，中原为苗蛮族先民蛮夷的炎蚩部众所居，在黄河中原发展农业，开发祖国，给当地留下了蛮夷语的地名文化。同鲁（独鹿）吉鲁（晋鲁、冀鲁、豫鲁）宽广平坦的常耕地的内涵，极为可能是独鹿、晋鲁、冀鲁大地的初始含义。但亦有人望文生义，附会“涿鹿”为赶鹿之地，并得出结论，说蚩尤是汉族先民的打猎部落。此说，无法解释与涿鹿同音异译的“独鹿”，故不能成立。事实上，“据古籍记载，蚩尤九黎部落生活的年代和地区，是五千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这一地区考古发现‘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是蚩尤九黎族裔所创造”^⑨。汉文古籍“《尸子》一书说：‘造冶者蚩尤，蚩尤之时，烁金为兵，割剡为甲，始制五兵。’《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这一记载说明蚩尤九黎部落最早发明铜的冶炼技术并用来造五兵。”^⑩可见蚩尤不

是华夏先民的打猎部落，而是能造五兵的三苗先民蛮夷族的农业部落，并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加工场，否则是造不出五兵的。

关于夷，除指称东夷外，有时亦指称苗族（或苗蛮），如明代学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指出：“屈原《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南夷’即武陵西南蛮夷，今辰沅之苗种也。”辰沅，系指湖南西部辰州及沅江流域即五溪地区的苗族，亦即为《风俗通义》所载的盘瓠子裔，号曰蛮夷的蛮夷。此崇拜盘瓠的蛮夷族，“至少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经在五溪地区生息繁衍了。并经历了新石器、商周（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乃至今天。”^⑨

三、东夷苗蛮的由来

东夷与苗蛮，二者均属炎族神农、蚩尤之裔。这个以炎帝称谓的炎族，正是徐旭生先生所言的“在华夏从西方来之前，中国土著还有苗民一族，实属最容易想到的事情。”这个苗民一族，古称蛮夷（或蛮），即三苗族的先民，由长江中下游及淮河中下游平原曾先于黄帝北进中原，并在尧帝与三苗见之于史载之前的千余年，就已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生息繁衍，发展旱地农业文明了。当历史进入涿鹿（独鹿）中原时代，黄帝族由西部陕甘青高原进入中土，此时，神农第八世孙榆罔，袭号炎帝。当时，黄帝族与炎蚩族（北进中原的蛮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在涿鹿（独鹿）大地征战。据王献唐先生考证认为：“《古史略考》：炎黄二帝用师以相挤，而战于涿鹿，是炎帝兴师伐黄帝，乃黄帝三战，而炎帝败也。初蚩尤未至，闻败追而从之，亦至涿鹿，以挤黄帝，黄帝九战九不胜，卒

大胜之，仍在涿鹿。蚩尤与榆罔争王，炎、黄合谋之，乃黄帝晓示天下后世语耳。”“《庄子·盗跖篇音义》、《周书·尝麦解》皆以蚩尤与榆罔争王，榆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④对此，民国学者盛襄子在其著《湖南苗史述略》中，亦有论述：“《黄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欺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是知炎黄二帝本非同德，而蚩尤为三苗之长，系炎帝诸侯。初炎帝榆罔求助黄帝，事成而悔……此后……不能问鼎中原矣。”“按神农、黄帝二帝，并不同时，农帝之八世孙榆罔与黄帝相及。而《周书》言天下作二后，则为南北割据之势可知。”^⑤

黄帝族占领中原后，原在中原的语言朱离的蛮夷，即为三苗先民蛮夷族的炎蚩部众，被“黄帝既为黄河流域而驱逐炎裔，炎裔原在黄河流域东方者愈驱而东，为日后之东夷。……其在黄河流域南方者愈驱而南，为日后之苗蛮。”王先生还考证说：“1932年，山东滕县出土邾国彝器，作者由邾器铭文考证三邾氏族，认为邾族即炎帝后裔被黄帝族征后流徙东方的一支，亦即所谓东夷。”^⑥这里所说的炎裔，即为如前所述的炎蚩部属，亦即三苗先民的北支，古称蛮夷，先于黄帝北进中原发展旱地农业。此支北进中原的蛮夷（炎蚩部众），一部分在当地被同化，另一部分徙东去黄河下游的山东及江淮之地被称为东夷，徙回故里南方者被称为苗蛮（南蛮）。“东夷之区域，由青、齐而海隅，而兖、徐……苗蛮之区域，由河南南部而皖而鄂而浙而赣而云贵。”^⑦由上可知东夷苗蛮的由

来，但还不是二者的族源，因为，绝不是因被黄帝驱赶而东而南的人们（三苗族先民蛮夷）的迁入，东土与南国才始有人类和文化，事实上，长江中游大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证明，“在长江流域，城市文明出现的时间比黄河流域早 1000 年”，“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是由中游向上下游发展的”。^②正是长江中下游崇拜盘瓠的蛮夷，即三苗先民的北支，通过汉水与江淮的支流，最先北进黄河中下游，发展旱地农业文明，开发祖国的中原，才有后来的涿鹿之战，涿鹿大战的结果，被称为炎族或炎蚩族的北进中原的蛮夷，才一分为二即苗蛮与东夷。黄帝族入主中原后的九黎国与三苗国，就是蚩夷族的子民离开中原后，在黄河中原之东（黄河下游及江淮之地）之南（黄河流域之南至长江中下游流域）建立的国家。历史文献屡称“九黎之后为三苗”、“三苗为九黎之后”、“蚩尤‘黎九君’，‘三苗之首’。”可见东夷与苗蛮的亲缘关系和由来。东夷与苗蛮由此始。

注：

①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册，第 85 页。

② 韩建业、杨新政：《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载郑州《中原文物》1996 年 4 期 44 页。

③ 杨 上：《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几点意见》，载《民族研究》1986 年 4 期。

④ 熊锡元：《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载《民族研究》1986 年 4 期。

⑤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版第 57 页。

⑥ 侯哲安著：《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第四章《羿》，贵州民

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6集,1980年10月。

⑦ 张 雄著:《中国中南民族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11至12页。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7月版,第18、82—83、15、85、86、86、65、61—65—66、23、1、27页。

⑩⑪ 杨培德:《对电视剧本〈涿鹿大战〉的研讨意见》,载黔东南州文研所《苗侗文坛》1997年第3、4期合刊,第93页。

⑫ 舒向今:《试论怀化高坎垅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双头大形陶塑》,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⑬ 盛襄子:《湖南苗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第4期,1937年4月。

⑭ 《中日联合考察团认为长江人类文明早于黄河文明》,载《参考消息》1996年11月1日8版“中国大地”。

〔责任编辑 扬 鬓〕

(上接 P20)这对促进民族经济和民族传统手工艺品——侗锦的繁荣发展,无疑有积极作用,是侗民百姓所称许的。

本文资料来源:

① 《清史稿·列传·胡林翼》。

② 《中华姓氏通书·胡姓》。

③ 《黎平县志》。

④ 《胡林翼家书精选》。

⑤ 《胡文忠公遗集·论东路事宜启》。

⑥ 胡林翼:《条陈东路可虑情形十五事》。

〔责任编辑 扬 鬓〕

言战不如言守 用兵不如用民

——胡林翼在黎平侗族地区建保甲办团练事略

□ 杨再将

胡林翼(1812—1861),字貺生,号润芝,湖南益阳泉交河长冈村人,清末湘军四大将领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改贵州知府,署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等地,用明戚继光法办团练,以平“苗乱”有功赐花翎,又因防剿新宁李沅发起义擢道员。累官至湖北巡抚加头品顶戴、太子太保并骑都尉世职。为清廷封疆大吏,中兴名臣。卒谥文忠,追赠总督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有《胡文忠公遗集》传世。

咸丰元年四月(1851年5月),胡林翼卸思南府事,来署黎平。黎平始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置府。宣德以后,辖境相当于今黔东南清水江以南、榕江县以东地域。府境山川环绕,是我国侗族腹心地区。东与湖南毗邻,南与广西交界,横亘二百余里。云、贵两省调遣军队及来往文告,均由此地经过,实为交通要道,其地理位置比别处更为重要。当时,黎府政局动荡,地方不宁。道光三十年(1850),湖南新宁李沅发农民起义军由广西入洪州,江忠源(新宁举人)率团练尾追至大信屯以阻归路,淡树琪(黎平知府)、陶履诚(开泰知县)协黎绅督令乡勇抵御于双江口。李沅发联合邓福鸟率部进入下温、潭洞,驻守特洞。后出平茶马路口,与楚军将领哈心靖遭遇,哈战死,农民军活动于黎(平)靖(州)边界一带。咸丰元年(1851),起义军与官军激战于纪南坡、水口等处,因众寡悬殊,乃退

至广西境。同年一月在金田起义的太平军，已克昭平，其势迅猛。而黎平当地，则会众甚夥。其巨魁有老冒、老三哥、大五、大六、大九等，皆凶悍异常，横行乡里。安分守法、软弱无力的百姓深受其害。

咸丰元年四月初四日(1851年5月4日)，胡林翼走马上任，在地理不熟，人缘陌生，人心未得的情况下，即接见当地士绅，都说黎平30年来，地方备受蹂躏，侗民暗无天日。翌日，他接到一宗杀人抢劫案，系惯匪大肚皮欲吞没宗室财产，率众抢劫，并惨杀三条人命，奸污妇女一名。这样的案件，在黎平是极为普通的事，不足为奇。胡林翼考虑到当时军事松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国库空虚，人心虚伪、怯懦，实难一时挽回危局。在“抚固不能，剿又不易”的窘境中，胡林翼向朝廷上书提出“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卫不如先用地利以卫民”的主张，采取“先清内匪，再防外盗”的办法，建立起乡正、团长、牌长互相稽核的保甲制度。即本寨有人出外为盗，则责成本寨乡正、团长、牌长等人查究；外寨有盗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则责成本寨、邻寨乡正、团长等人查究，罚钱交寨，充公备用，而官员则不直接插手。同时组织地方武装，兴办团练1500余寨，建筑哨卡435处，连屯相望，严扼要隘，派民伏4至20名不等，分班轮流守护。逐月委派官员及老成绅士，分别带领已受训练的团丁150余名，踏遍各乡巡查并劝说，一遍完了又来一遍，以守保甲的措施，防止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先后剪除并惩罚了杨浪子等匪酋，人民才稍得安定，长途旅行的人才少了几分忧虑。这样，花费不多，收效甚著。

据胡林翼查知，近30年来，黎平因防御抵抗盗寇调兵3000名，累计3个多月时间。每兵每日派给长工1名，折银5分付款外，还用了6万多名伏役。这段时间内，侗族人民弄得疲备不堪，艰难困苦，怨声载道。他们愤怒叹息道：“官兵到来还不如盗贼来呀！”另有带兵押运军粮费用、文官武将费用、供官员差遣的跟差官役费用、月支盐菜折价的费用等等银两，还没计算在支出内。此外，还有稿房备弁，都是虎视眈眈地要钱，美其名曰“按军需旧例收费”，千方百计地向地方索求，滋扰生事，

简直不堪忍受！地方官因置办兵差军需，已向国库支领各款费用，却又任意列款向下摊派，又不下数千万两银子。估计调兵 1000 名，每月口粮米银钱 249 两，盐菜银两 900 两，兵丁、长伕银 1500 两。加上预支军装银钱 2000 两，文武官将、职员警卫、随班跟差的月支银两和兵将例外奖赏酬劳各种费用，头一个月总领 6000 多两。从第二个月起，除去军装费用，也得有 4000 多两。而需要索派的伕役，每名仍须用 1 名、2 名不等。在 10 里、20 里之外巡查，不是官方为他们找好伕役配备，便一步也不走。况且巡查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们白白地守护着空营，又不能深挖堑壕，使营地如天险般屹立，有恃无恐。

胡林翼引用韩非子的话说：“征兵满万，不如招募数千。”他只在黎平南路与广西接壤的乡寨里，用钱财雇用强健精干的侗民百姓 1000 人，选择老成练达的乡绅率领，发给铁锹、锄头、畚箕，选择重要隘口，诸如八乐、广梅坳、水口、云洞等处，筑土堡防守。每月抽出一、两次时间，仍将他们编成军队，教授作战技术，使他们懂得且战且守的战略战术。老百姓没有遭受威逼的担忧，盗贼没有擅自掺杂进来的情形。土堡筑成之后，声威一振，民心更加安定。那时每堡只需要三、五十人守护，调防的士兵还可以酌量减少，没有一定要满 1000 这个数的必要。大概乡兵 1 名，每天给米 1 升，工钱 40 文，合银子 3 分 5 厘。用乡兵 1000 名，每天连米钱计算在一起，共须银子 35 两，每月需银 1050 两。如果公仓的谷子可以调拨地方，或者从古州（今榕江）这个地方水运便利处主船碾米漕运，则除去口粮米价银钱 450 两，每月只需要工钱银子 600 两。又造制器械旗帜，购买竹木绳索，付给委员、绅士的薪水，加上盘查奸细、犒劳奖赏等费用，至多不过二、三百两。每月所需费用，总共不过 1000 两。与调兵 1000 对比，实际省去四分之三的费用，而功效倍增，又无征调遣发的烦恼。本土本乡的百姓，保护乡里，护乡情真意切，勇气自然倍增。革除多收费的弊端，而又能收到地方安宁的实效，他认为没有比这种措施更好的了。

然而，从当时尖锐的社会、民族矛盾中，胡林翼深感“招募此间”（任